

严斐德：从西班牙医生到中国人民一分子

□ 张少东



严斐德（1903—1955），1903年出生于布拉格一个开明的犹太人家庭，后随父母迁居到维也纳。严斐德是他的中国名字。他于1939年来到中国支援抗战，从此与中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国际主义战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社会动荡不安激发了很多年轻人的政治热情，处于青少年阶段的严斐德也不例外。1923—1929年，严斐德在维也纳大学学习医学，期间受到工人进步运动的影响，拿到博士学位的同时，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严斐德大学毕业后行医的同时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34年，他在对共产党员讲授马克思主义课程时被捕，1935年4月出狱后他开设了自己的诊所，继续投身反法西斯活动。严斐德是在欧洲动荡不安的环境中接受了进步思想，成为一名反法西斯战士的。

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各国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掀起声援西班牙共和政府的运动，来自众多国家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组成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参加战斗。国际纵队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怀有解放全世界受压迫者的情怀，入伍时都签署了誓言，誓言结尾写道：“我自愿来到这里，为了拯救西班牙和全世界的自由，如果需要，我将献出最后一滴血。”受这种进步力量的感召，1936年8月，严斐德前往西班牙，成为第十三纵队的主治医生。在西班牙战场上，严斐德豁出性命救治伤员，成为医护人员学习的楷模。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火中，严斐德成长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

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西班牙医生”

1938年9月底，西班牙共和政府战败，国

际纵队被遣散和驱离，不能还乡的人员撤往法国，被法国当局关进拘留营，严斐德即在其中。后来，他逃脱了法国拘留营，到达伦敦。在反法西斯的另一个战场上，中国人民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1939年5月，严斐德跟随英国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与德国的白乐夫、捷克的纪瑞德一起，前往贵阳图云关的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1939年底，更多医生来到图云关，他们都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因此被称作“西班牙医生”。当时贵阳的医疗条件非常落后，他们克服各种困难，住茅草屋、睡竹板床、吃糙米饭，力所能及救助病人，并且一再要求到前线去救治伤员。严斐德是第一批到湖南抗日前线的战地医生，他不仅在战场上救死扶伤，而且还奉命于1940年夏天，穿过日本重重封锁线，把一批药品从香港安全运送到贵阳。

1940年7月底，严斐德在湖南的工作合同到期。此后，他辗转江西、福建、广东、重庆、云南、广西、贵州等多个省份行医，他的医德与医术得到了很高评价。在严斐德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岁月里，他亲眼目睹了战火中“衰老的、被榨干的、被践踏的中国”，中国底层人民因此遭受着各种苦难，但是那些穷苦的脚步却不需要监督，总是完好无损地把价值远高于他们血汗工资的货物运到目的地……经历无数这类小事后，他认识到只有消除自己是“体面人”的观念，把自己真正置身于中国人民之中，“最终才有权宣称：自己也是中国人民整体中的一分子”。

坚定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

来到中国的“西班牙医生”有着共同的愿望，就是去解放区参加抗日战争。1939年夏，严斐德和白乐夫在重庆拜访周恩来，提出要到西北参加抗战。为顾全国共合作大局，周恩来表示无论在哪里都是支持抗战，劝告要求去解放区的“西班牙医生”留在国统区救治伤员。有几名医生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延安，但被国民党发现后都被遣送回重庆。严斐德牢记着周恩来的劝告，同时也始终盼望能有机会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工作。他给弟弟博比的信中写道：“中国这里有些东西，回家之前应当看一看。我同一伙人有联系，他们希望我在旅行条件容许的情况下尽快去看他们。我很乐意为此。”他给父母的信中也含蓄地写道，一些中国机构是“值得尽力的”，他也为那些在后方从事危险工作的人们治病。他所说的一伙人、这些机

构，实际就是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机构。这期间严斐德为共产党员王务安治病时，两人因共同的理想信念走到一起，1945年4月，在重庆周恩来的住处，严斐德与王务安结为秦晋之好。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严斐德再次产生了去延安的想法，他对两位西班牙医生海因里希·肯特和埃迪特·肯特说：“延安一定需要我们，假如他们想要对八路军动武。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办法，到那里去帮助减轻痛苦，帮助病人和伤员，必须及时赶到现场。我们知道，国民党在战争期间藏起了多少武器和飞机，准备用来反对毛泽东。”但是严斐德去延安的想法仍然没能实现。1946年1月，他转赴江苏继续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为使救济物资不受政治干扰地进行公正分配，他不顾国民党政府百般阻挠，越过国共占领区分界线，亲自到解放区考察，返回后极力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向解放区受灾群众送去救济物资，他还为解放区做了大量其他公益性工作。此后直到返回奥地利，严斐德大部分时间都在解放区度过，他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饱经战火的土地上忘我地工作、为革命和自由而献身，解放区农民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

1947年12月，严斐德和王务安返回奥地利。他撰写了《中国胜利了》一书，该书中国对中国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表达了深切同情，揭露他亲身经历过的国民党政军的腐败，赞扬他亲身感受到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民主、平等及英雄主义精神。他因此坚信，中国人民“正站在一场大革命的中心；这场革命势必推动亚洲殖民地和封建国家的千百万人，使他们也投身于革命行动中”。

1953年，严斐德作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报《新德意志报》和奥地利共产党机关报《人民之声报》驻远东记者，被派往中国担任常驻记者，他和夫人王务安也一起迁居北京。再次来到中国的严斐德对新中国充满信心，他的足迹遍布新中国各地。1953年，他作为记者前往朝鲜参加《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1954年又先后到达越南和日内瓦，报道越南相关情况，他把自己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篇感人至深的新闻报道、文章与诗歌。1955年4月，严斐德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前往万隆采访亚非会议，由于国民党特务在飞机上安装了炸弹，飞机在途中坠毁，严斐德罹难牺牲。

严斐德是一名为理想和信仰而战斗的国际主义战士，是一名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勇士。他的名字刻在了中国历史上，诚如他希望的那样，他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整体中的一分子了。



宣统元年（1909年），已经执掌后宫的隆裕太后决心修建一座“水殿”，亲题殿名“灵沼轩”，计划在殿中下层蓄养鱼群，以环绕一周的玻璃为窗增加观赏效果，观者可在殿内透过玻璃欣赏鱼景，宛若置身海底，因此“灵沼轩”亦称“水晶宫”。

然而在遥远的古代，除了靠海谋生的渔民，能近距离接触海洋生物的人并不多，神秘大海里的众多生灵仅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中，存在于文人的作品里。

对海洋生物的记录与想象

历史上的中国常被认为并不太重视海洋的价值，但事实并非如此。汉武帝一生至少10次东巡观海；秦始皇更是一个极其向往海洋的皇帝，他曾在芝罘等地刻石，以记颂其武功威德，并手持连弩射鱼，还派遣方士徐福入海求仙，寻找长生不老药，支持了最初的海洋探索活动。

寻药的徐福最终下落不明，后人认为他到了日本。而在当时，他的不归，预示着秦始皇一系列希望落空的同时，似乎也是对海洋无以回应的最终注脚。海洋幽暗而阴晦，充满未知的危险，“未知”既是一个让人恐惧、敬畏的开始，也是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发源地。

《山海经》这部古老的奇书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书写海洋的经典之作。前5卷是“山经”，中间有8卷是“海经”，后4卷是“大荒经”，最后一卷为“海内经”。虽然“山经”在前，但从篇幅来看显然“海经”居多。书中描绘了许多与海洋有关的生物，比如《大荒北经》里的烛龙，可以不吃不喝不睡，还能呼风唤雨，眼睛一睁一闭就是昼夜的轮转，如同大海恒动不息形象的化身。对远古人物的描绘也常打上海洋底色，比如刑天，他来自炎帝氏族，居住于海边，在《山海经》中的形象犹如螃蟹。

古人对海洋生物的记录不仅仅是想象，也包含了认真的考据。明万历人屠本峻著《闽中海错疏》，记载了福建沿海地区的水产动物的形态、习性以及分布等，对海洋生物分类有一定贡献，但其首要书写动力还是“物之大莫若鱼，而味之美亦莫若鱼”，大概“吃”是人类开发世界的永恒动力吧。“海错”一词出自《尚书·禹贡》，中有记载“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后成为海味、海洋生物统称。

另一本据说乾隆皇帝枕边书的《海错图》，也是位画家兼“美食家”的杰作。此书是清代画家聂璠所著，共有4册，记载了300多种海洋生物，被誉为藏在故宫的古代“海洋博物馆”。上述关于“海错”的著作，无不透露出作者对美味海鲜的深爱，说他们不是“吃货”也实难令人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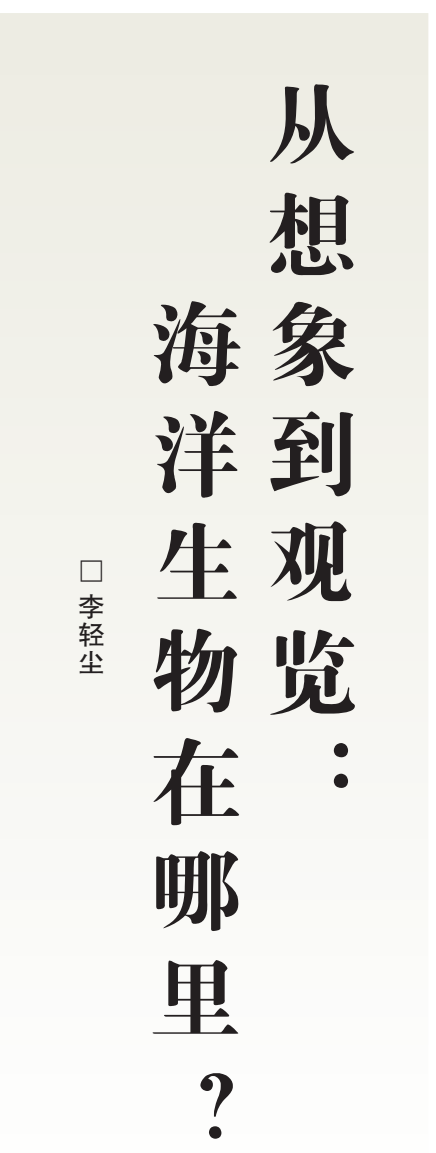
不过，《海错图》不仅有大量的纪实作品，也添加了不少想象成分，像会吃人的“海蜘蛛”以及寓意不吉的“海和尚”，等等。清代才子袁枚在《子不语》中对海和尚进行了描述，说是“遍身毛如猕猴，髭其顶而无发，语言不可晓”。在各方志中记载的故事也不少，像康熙二十八年渔民在富宁州海上捕获了一只大鳖，刚露出水面，一看居然挂着一张人脸，吓得大家又慌忙把它丢了下去。海中既有美食也有危险，海洋代表着未知、冒险和边缘，也象征着奇巧、利益与霸业，勾起人类无尽的征服欲。

贸易的动力

在中国政治和舆地学认知里，海洋已经到了一个王朝统治能力的边缘，也是人们可知事物的边界。然而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航行路线不断开辟，航海图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航海图是南宋《舆地图》，标注了到达日本的航线。但至今可见的航海专图，应是明代摹绘元代的《海道指南图》。明代是中国航海图制作的巅峰，“郑和下西洋”后《郑和航海图》随之被绘制。

清代大规模的官方航海活动已不多见，但对海洋贸易早已司空见惯。《管子·禁藏》对海洋之利分析透彻，“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经济利益一直驱使着人们泛舟于波涛之中。历史上，对南中国海至南太平洋地区的海参贸易，中国实现了长期掌控，到18世纪70年代，中国的市场价值已令人无法忽视。

对华贸易的巨大逆差让英国商人积极寻找高利润的对华贸易品，于是通往中国的“极东航线”（英国探寻的连接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航线）被开辟后，殖民者开始将目光转向了大洋洲海域分布广泛的海



豹，它们的毛皮能在广州获得巨额利润。航海图的日趋成熟与世界贸易发展相辅相成，全球化的深入带来了近代海洋贸易的繁荣，也催生了知识的共享。

水族馆与海洋研究

随着海洋开发的深入，对大自然征服的重要一步，是给生物进行种类划分，“博物志”知识开始从纸面阅读变成观览。自1853年世界上第一个用于展览的水族馆在英国摄政公园对大众开放后，柏林水族馆、巴黎水族馆等也相继建立。1878年，威斯敏斯特的水族馆里的一条鲸鱼，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柏林大水族馆里也放置了不少稀有海洋生物。这一时期的西方水族馆不仅为观赏，也是为研究海洋物种而建，将人们带入深奥的海底世界中。

中国也紧跟世界潮流，开篇述及的灵沼轩，是一个未曾实现的水族馆愿望，在建筑方面有着浓厚的中西合璧特色，隆裕太后专门从自己的财库里拨款修建，但随着两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工程也随之中断。不过即便建成，其旨趣也最多为皇家观鱼而已。

近代还出现了劝业会以及博览会中的海洋生物展览。博览会起源于工业革命前夕的欧洲，各国展示自己物质文化的活动很快风靡全世界。191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参考了1903年日本大阪内国劝业博览会的布局，右侧设有水族馆、教育馆等展厅。劝业会闭幕后，还出版了《南京博览会各省展品调查书》，被誉为“有凭据的清国物产志”。

自1862年英国举办伦敦渔业博览会以来，在各国的竞相扩张中，渔业已经和国家海权密不可分。为此，当1905年意大利邀请清政府参加将于次年举办的米兰世博会时，正在经营江浙渔业公司的民族实业家张謇认真筹备，其展示的海产品、渔具、地图等共获奖牌百余枚。

到1928年，全世界共有公立或私营的水族馆45所。1930年，中国科学社成员在青岛开会，蔡元培等倡议建立中国海洋研究所，筹备计划有3期，第一期便是建立水族馆。1932年，中国的第一座水族馆终于在青岛成立。水族馆共4层，有标本室3间，海水玻璃展览鱼池18个，露天鱼池2个，还有研究室、储水塔等，从海上捕获的一些海洋生物，海牛、海象、海龟、海豚等，既用来展览也用于研究。

从想象的水族生物，到人们可以近距离看到甚至触摸到海底生灵，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水族馆的建立意味着曾经不可知的海底世界正慢慢被人类熟悉和掌控，对自然世界的征服似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2015年的一部电影《海洋深处》描述了人们在“未知世界”捕猎鲸鱼的故事。大约从中世纪开始，鲸鱼油成为西方最重要的燃料来源之一。因此，19世纪初新英格兰地区的出海口，还在持续盛行着捕捞鲸鱼的活动。影片中年轻、俊朗的主人公充满男子气概，正对应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不可一世。然而在捕鲸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头智慧过人的白鲸，这位海洋生灵不仅不愿坐以待毙，反而施计让满船人员几乎折损殆尽。一个来自21世纪的弦外之音传递到观众心中：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人类更要敬畏自然，因为放眼历史，人类对自然从未有过真正的征服。



刘秀是如何克制亲情私欲的

□ 吴小乔

人有七情六欲，有私心、私事、私情、私恩，实属平常。但要想成大事，立大功，建大业，就非做到先公后私、公私分明、公而忘私乃至大公无私不可。不如此，就不能服众，就很难成就大业。因此，对于居上位者来说，做到大公无私，一心为公，既是一种政德修养，也是一种为政要求。

历史上不乏持公守正开启基业的君王，比如汉光武帝刘秀。事实上，刘秀能从一介布衣，到成为光复汉室、开一代盛世的君主，除了雄才大略、任贤使能之外，便是持公守正的魅力，为他赢得了人心、收服了人心、聚拢了人心，让大家都觉得他最讲公道，在他的持守下，人心里就有一种确定性，觉得跟着他干没错。

比如，新莽政权刚刚覆灭的第二年，更始二年之时，刘秀还在艰难创业过程中。当时，他的一个年轻仆从犯法，执法者祭遵毫不留情，抓住这个仆人就杀了。刘秀一看，这祭遵居然一点都不看自己的面子，便很是愤怒，立即让人把祭遵抓了。这时，主簿陈副谏言道：您经常要求军纪严明，现在祭遵执法严格，不徇私，这是您的命令得到执行啊！刘秀一听，立马醒悟过来，饶恕了祭遵，还提拔他为刺奸将军。不仅如此，刘秀还对众将说：“当备（小心）祭遵！吾舍中儿犯法尚杀之，必不私诸卿也。”

刘秀事发之时这一怒，是人之常情，说明刘秀也是常人，也有着常人的七情六欲。但他能听得进良言，能克制自己的私欲，说明刘秀又非常人，有常人所没有的胸怀与格局。进而提拔任用祭遵，提醒警告诸将不要犯法，犯了法没人会保你，说明刘秀是有大抱负、能干大事的人。

也许有人说，这时刘秀还在争天下，多少还有点收拢人心的意思。但在他称帝之后，依然始终持守公正，表明他对公正公道的坚守出

于本心。仅从这一点看，刘秀能得人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公元35年，刘秀的叔父赵王刘良越规被弹劾，刘秀没有护短。要知道，对于刘秀来说，刘良如再生父母。刘秀少年丧父，是刘良把他抚养大的。刘秀对刘良恩宽有加，刘良在当时是最尊贵、最显赫的皇族。刘秀能如此坚守，可谓难能可贵。

刘良被弹劾，是因为有一天，刘良参加完葬礼回来，入城时和中郎将张邯争路，斥责张邯掉转车退回去，又责骂城门守卫，罚他往前走十步。刘良此举，多少有点霸道无理、高人一等的味道。这也是一些人常犯的毛病，有的人得势便张狂、仗势便欺人，以为有人护着罩着，就全然不把他的人放在眼里，视规矩法令为摆设。但刘良这一傲娇，便有司隶校尉鲍永弹劾刘良，称刘良不守臣子的礼节，犯了大不敬之罪。史书上没有记载刘秀是否治了刘良之罪，不过鲍永敢于弹劾，使满朝文武对他肃然起敬。而能用这样的臣子，本身就说明刘秀任用秉公之人的用心。当时，鲍永又征召扶风鲍恢当都官从事，这个鲍恢也是刚正不屈，不畏强权显贵。刘秀便经常对臣下说：“贵戚且敛手以避二鲍。”这表明，刘秀希望任用这样秉公执法的臣子来实现善治，使强权显贵、皇亲国戚们收敛。

后来，刘良临终前，刘秀去看他，问他还有什么未了心愿，有什么话要说。刘良便趁机向刘秀求情，请求放过他的好朋友李子春。原来，李子春是刘良的豪门，他的两个孙子杀了人，怀县县令越意一查到底，结果这两个孙子自杀，李子春被捕入狱。当时洛阳的皇亲国戚都为李子春求情，赵意一概不答应。所以刘良临终请托，希望刘秀能饶他一命。

此时的刘秀虽对刘良心有不忍，却仍然持守公正，对刘良说，“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